



時尚風潮

攝影術與圖像解釋權的擴大

● 鍾淑惠*

西方商人來華時,在中國訂製許多手工藝品銷往歐洲,其中有一部分描寫中國情況的圖片,既以外銷為主,一般統稱為「外銷畫」,包括許多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例如茶葉的產製過程、生活狀況乃至婚喪喜慶等各種習俗。雖然今日眼光看來,這種圖片並無特殊之處,卻是當時西方認識中國的重要途徑。

外銷畫中還有許多牽涉國防主題,例如中國的軍隊操演、軍備狀況,中國士兵手持刀、劍,騎馬彎弓的情況都一一入畫,充分顯示當時的中國仍在「冷兵器」階段。這些圖片使得當時已經使用火藥、槍砲的列強清楚認識中國國防的實力。即使到了

1900 年義和團事變發生之後,法國拍攝的相關圖片亦顯示出中國軍備的落後。從各種圖片中,列強其實已充分掌握中國的虛實。(圖1)

外銷畫的製作,需要特殊的專業技能,訂購外銷畫者,也 有其一定的經驗及想法,因此儘管外銷畫保存了許多重要的圖 像資料,但其反映的問題可能並非全面。到攝影術發展成熟之 後,許多沒有繪畫技巧的觀察者也能將其欲表達的概念記錄下 來,圖像的解釋權因此擴大。

1830 年代,英、法等國已經發展出照相術,但是要到 1860年以後,技術才逐漸穩定,並普遍運用。而 19 世紀的 50



圖 1: 倫敦亞非學院所藏之外銷畫

^{*} 鍾淑惠,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年代正是攝影「東方文化研究」的偉大年代。¹19 世紀後半期,西方諸國各行各業的人士也將照相機帶到中國進行拍攝工作。至此,有關中國的各種圖像,更普遍在歐洲流傳。另誠如蘇珊・桑塔格所提出的,歐洲攝影很受獨特而有趣的(即貧窮的、外國的、被時間蝕損的)、重要的(即重要的、出名的)以及美的記號影響,因此他們的照片傾向歌頌讚美或指向中立。²這概念將影響攝影者題材的選擇及構圖的安排。

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³於 1870-1872 年間深入中國內陸及沿海,拍攝大量照片並出版《Views on the North River》、《Foochow and the River Min' in 1872》兩書。約翰·湯姆生自 1862 年到新加坡工作,便開始攝影,並至今日的泰國旅遊,還拍攝皇室,並造訪柬甫寨及越南。1866 年回英國出版並展出其攝影作品。1867 年再度回到遠東,這次到中國大陸旅行,拍攝大量照片,並計畫回英國後以書的形式出版。五年後約翰·湯姆生回到倫敦,出版中國攝影並建立領導的權威地位。其自新加坡至香港,花了五年的時間記錄中國,幾乎造訪全中國,從南方港口香港、廣東,到北方的北京、長城,及海外的台灣,並溯長江 3000 里。約十年的時間在中國旅行,他的題材範圍極廣,從乞丐、街頭生活者到官員貴族,從小鄉村到大城市,他視野中的中國文化及人民遠超過其他的權威。他和他的狗一起旅行,甚至造訪中國未曾見過相機的地方,常置自己於險地;為了攝影他必須設想許多不同的情況,且常在找不到化學藥劑時必需設法補充。重要的是他的技巧並非是技術上的:為了照片主題,他必須超越害怕及不信任。

由於停留時間長,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深入當地,熟悉被拍攝者,他不僅拍貴族官員及百姓生活,也拍風景、建築,對題材的詮釋深刻,將遠東的土地、文化、人民帶進英國。其鏡頭下的人物形像,結構上偏向西方,卻又突出中國特質,如滿族新娘、老婦、商人;中立的描繪庶民生活,如剃頭、漁民;但在景物的選擇,似受主流的影響,仍見殘破詩意的美感的表現。(圖 2~11)

¹ 見蘇珊・桑塔格(Susan Songtag),《論攝影》,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97,頁 116

² 見前揭書,頁 74

³ 被譽為 19 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其於 1878 年所出版的<u>《倫敦街頭生活》(</u>Street Life in London<u>)</u> 攝影集已成為攝影報導的濫觴。



圖 2: 湯姆生攝影作品: 北京恭 親王。1871-1872 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3:湯姆生攝影作品:廣東士 紳。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4:湯姆生攝影作品:滿族新 娘。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5:湯姆生攝影作品:廣東老 婦。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6:湯姆生攝影作品:itinerant barbers。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7:湯姆生攝影作品:Chinese Skipper, Yangtz。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8:湯姆生攝影作品:河南士 兵。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9:湯姆生攝影作品:Bronze temple, Wan-Show-Shan。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10:湯姆生攝影作品:Chao-Chow Fu Bridge。10 Chancery Lane Gallery 網站



圖 11: 湯姆生攝影作品: 長城 (大英圖書館藏)

1871 年四月,在因緣際會下,他隨著蘇格蘭同鄉馬雅各醫師到了南台灣。他攜帶著大型笨重的攝影器材,在打狗(今高雄)、台灣府(今台南)和高屏溪流域附近的平埔族聚落(木柵、六龜)進行攝影之旅。從他的鏡頭下,可重窺百年前平埔族獵人和婦女的衣飾形貌,以及舊日福爾摩沙秀麗的山川。1871 年 8 月回中國。1872 年返回英國定居後,著手書寫及演講其經歷,1873 年,湯姆生於倫敦的單色版印公司(Autotype Company)親自挑選出 220 張照片,以當時最尖端且解析度極高的珂羅版法(collotypie)沖印,同時,將此 400 套的 96 組相片 4 的解說文字另行印出,並收錄於共四卷的《中國和她的人民圖鑑》(Illustrations of China & its People)攝影集中。可說是第一位踏足中國的「攝影報導家」,其透過攝影讓更多人看見中國。這完整的 96 組

⁴ 旅台三十餘年的法籍製片家兼出版商魏延年(René Viénet)先生,多年保存湯姆生在 1873 年的 96 組相片的散頁,魏先生表示,這些照片都從未公開,它們都是由底片副本複印而成,而正本則在湯姆生 1921 年逝世前數年贈予倫敦維爾康圖書館,保存至今。在 2006 年 2 月初的台北國際書展期間,魏先生精選 30 多張台灣部分的照片,搭配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照片,另與當代創作組合成「從地面到天空:台灣在飛躍之中 1871-2006」攝影展,重新發見古老的台灣人、地之影像,審視 130 餘年前西方人眼中的台灣形象,這批珍貴的收藏首度曝光,甚至連藏有湯姆生玻璃負片與完整相冊的衛爾康圖書館,也希望繼台灣展覽之後能於英國展出這 96 組相片。另有 50 多幅 19 世紀的銅雕版畫作品同時展出,由於當時人們還不知如何在書中複製相片,因此直到 1895 年之前,湯姆生的相片如欲大量發行供世人閱覽,唯一的方法是將照片以銅雕版畫技術複製印刷。再者,在展覽中還有一幅十九世紀歐洲 Aiguebelle 巧克力的包裝紙,包裝紙上印著台灣古地圖、高雄港一隅,以及一位男性原住民的組圖,那正是取材自湯姆生的攝影作品,湯姆生鏡頭下的台灣隨著他回英,在歐洲流傳。



照片,無論在台灣或中國都未見收藏。對於藏書家與攝影歷史家而言,這些照片具有極高的價值。依當時的習慣,這些沖印出來的相片總是以裝訂成冊的方式處理,因為他們無法「曝光」,讀者只能靠著翻動書頁始能親睹穿插其間的珍貴相片。藏有湯姆生其他攝影作品集的法國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與藏有湯姆生的原版負片與完整相冊倫敦衛爾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的館藏均是如此。

另外許多以倫敦為基地的傳教士將在中國所拍攝的相片保存的相當妥善,但由於這些團體缺乏研究能力,便將之捐贈給學術團體;也有一些貿易商或使館人員的後人也將家傳相片捐出,使得這些單位的收藏更為豐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便藏有大量的相關相片。這些相片顯示各種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士對中國的觀察,他們對中國的興趣是較為廣泛的,包括:纏小腳的婦女(圖12)、人力車伕、廟會、建築等。戰爭與征伐也是相片的重要主題,從中我們更可以看到當時西方人對中國軍備落後的描寫。而私人收藏家魏延年先生所收藏的關於福州船政的38幅老照片,更可一窺當時中國在軍事上力求進步的努力。其中部分為法人日意格所拍攝,其在馬尾船政創辦之初受聘為船政正監督,在福州船政工作20年,所拍攝照片,多是船政創辦之初1866年至1884年間,船廠建設及造船工作照。5雖然攝影術的普遍雖使外銷畫逐漸減少,但也使得西方人對中國的觀察更為直接。



圖 12:天足與小腳⁶

⁵ 魏延年先生收藏的 38 幅福州船政老照片,其中除日意格拍攝外,另有一些船政聘請的法國專家、監工、在福州海關工作的洋人、外國傳教士、歐洲航海家、探險者、攝影家拍攝。於 2006 年 12 月 23 日的「福建船政 140 周年大型攝影圖片展」首次展出。

見 Colin Mackerras, 「West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頁 167



比較中西雙方的圖像資料之後,我們可以輕易發現,中國對西方的認識相當膚淺,認識的層面也有限,大部分為平民間的謠傳,少部分則為知識份子間傳播的二手資訊。但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識則相當全面,不僅對地理位置有清楚認識,對生活、風俗的觀察也相當深入。在中西衝突的過程中,西方人掌握清楚的資料與細節,中國則一直處在五里霧中,不辨方位,到20世紀以後才稍有改正。